

危险生意：保护自然，还是保护财富？

作者：Audrey Irvine-Broque & Jessica Dempsey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

摘要

金融是许多危害生态系统的活动的前提条件，但如何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回顾了与自然相关的财务披露特别工作组 (TNFD)，这是一项由企业主导的工作，旨在确定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如何可能为公司和投资者带来财务风险。这一方法也被作为管理企业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战略加以推广，其假设是风险披露将更有效地对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活动进行定价。我们评估了 TNFD 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的潜力，并邀请自然保护科学家、从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对其变革理论进行批判性研究。我们发现，披露生物多样性风险与引导资金远离环境退化之间的关系既脆弱又未经证实，因此这一机制不足以解决金融行业对自然的影响。我们对接受另一种由行业主导的机制表示质疑，因为这意味着缺乏信息是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障碍。此外，这种金融部门应对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有可能会加剧权力和财富的高度不平等集中，而这本身就不利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所呼吁的变革。

引言

五十年来，全球环境目标的进展停滞不前。《自然与可持续发展》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社论认为，尽管过去五十年取得了某些积极成果，但资本主义 "至少在两个主要方面彻底失败了：财富分配，以及对大部分自然世界和我们对其依赖程度的说明"。今天，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生态破坏仍在继续，而我们的知识和努力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促使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IPBES) 呼吁在技术、经济和社会系统中进行 "转型变革"。

金融业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它对世界各地的自然界的繁荣（或不繁荣）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金融机构也认识到，环境的重大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底线，这可能是生态系统崩溃的直接结果，也可能是为了保护日益减少的生物多样性而对它们的活动施加更多限制的结果。过去，资助生态破坏只是某些企业社会责任账簿上的一个污点。而现在，它已被视为商业、金融甚至国家经济的系统性重大风险。

因此，金融业正在迎接生物多样性的挑战。但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论述的，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谁的利益得到了代表，谁的利益免受生态系统丧失的冲击，值得保护政策和实践领域的重要参与。

在这些努力中，最突出的是与自然相关的财务披露特别工作组，这也是本次审查的主题。TNFD 是继气候相关财务披露特别工作组 (TCFD) 之后成立的，目的

是在 "为各组织制定并提供风险管理和披露框架，以报告不断变化的自然相关风险并采取相应行动"。该框架旨在让公司和金融机构衡量和报告其所面临的与不可持续的自然退化相关的政治和经济冲击。这些风险包括 "有形风险"，例如公司赖以生存的供水或自然资源投入的变化；以及 "过渡风险"，例如可能导致公司无法获得许可或增加运营成本的立法变化。

TNFD 认为，企业和投资者的这些潜在损失正是机会所在：如果能够证明环境退化对收益构成风险，那么对这些风险的评估和披露将改善市场定价，从而做出理论上而言更明智的投资和企业决策。为了保护自己的未来收益，市场参与者将增加风险过高的公司的资本成本，或许会积极与所管理的资产接触以降低风险（例如，开展股东参与），甚至可能从这些公司撤资。TNFD 的变革理论认为，有关这些风险的更多信息将推动市场行动，而且这种市场行动将实现 TNFD 所描述的："最终目标，即支持全球资金流动从不利于自然的结果转向有利于自然的结果"。

TNFD 强调它是 "市场主导的"，其工作组由 "来自金融机构、企业和市场服务提供商的 40 名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但许多大型自然保护组织也认可 TNFD，而法国等国家也已开始按照 TNFD 的方法强制要求披露信息。最近，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的目标 15 也确认了生物多样性风险披露。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 TNFD 的联合主席 Elizabeth Maruma Mrema 当时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负责人。由于这种方法目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占据了重要的政治空间，我们认为值得停下来回顾一下它的一些核心主张和潜在影响。

在以下章节中，我们首先将 TNFD 置于国际环境治理的相应历史模式中。随后，我们从 TNFD 自身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估，以了解 TNFD 将如何实现其将资金流从危害生物多样性的活动中转移出来的目标，而保护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对 TNFD 的支持正是建立在这一目标的基础之上。我们主要讨论了金融风险披露是否是实现环境目标的有效或公正手段，但我们也讨论了金融部门的精英攫取生物多样性科学和政治的更广泛风险。在 TNFD 被接受为管理金融部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主要方法之前，应认真考虑这些局限性。

私营部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这并不是商界和金融界第一次坐到谈判桌前，推动他们喜欢的环境监管方式。在 1992 年的里约地球峰会上，关于如何解决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谈判达成了霸权共识，尽管这一共识存在争议。尽管里约会议产生了许多想法，但人们普遍认为，随后产生的环境治理的主要模式就是现在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强调 "自由"贸易、私人融资、自愿机制的核心作用，更广泛地说，就是利用市场作为环境治理的工具。这一共识是在 "可持续发展"概念下形成的，它使 "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与国际环境保护相一致，甚至是必要的观点"制度化。在形成这一共识的过程中，其他方法被挤到了一边，包括对有限地球上的经济增长的担忧，以及对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的全球资本流动的日益自由的性质采取更加规范的方法。

这一共识是如何达成的？在许多方面，里约峰会只是自由市场胜利主义在 1980 和 1990 年代经济和政治中根深蒂固的一面镜子。但是，即使新自由主义准则在 1992 年统治了更广泛的经济秩序，里约峰会也不仅仅是另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或贸易协定谈判。它当然是关注地球退化和贫困问题的地球峰会。而且，这次首脑会议只是反映了这种不平等和剥削成倍增加的制度，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市场导向的方法究竟是如何成为里约共识的，我们在本文中并不打算详述。但是，我们试图从这一共识的形成过程及其之后的跟踪记录中得出三个关键启示。我们认为这些启示对于评估目前提出的建议（如 TNFD）非常有用。

首先，经济增长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占据了中心位置。这种方法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经济自由化的目标配合得很好，但也抓住了全球南方国家政府对环境限制发展的反击，因为环境限制被认为是新殖民主义的。因此，*通过经济自身利益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做法得到了支持，而不是 "为应对结构性不平等而实现分配正义"*。

"可持续发展世界商业理事会和国际商会开始展示自我调节的含义：使《21 世纪议程》中关于工商业的章节符合它们的立场；进行游说，最常见的是成功地游说在《21 世纪议程》中尽可能不提及跨国公司；并确保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国际规章制度的想法也永远不会得到公众的接受"。

其次，自愿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机制成倍增加，代替了更加协调和有力的方法，但这些机制的效果很弱或无效。与此同时，自里约会议以来，助长农业综合企业、采矿、石油、天然气和林业等有害环境产业的资金流成倍增长。部分由于金融部门和生产性资产主要所有者的游说力量，控制或重新引导资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

在不削弱过去三十年中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所取得的艰难胜利的情况下，自里约会议以来形成的共识并没有成功减缓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速度，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速度仍然 "快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就要求进行变革：科学界告诉我们，过去不能重演，且我们没有新的三十年时间可以浪费。

评估与自然相关的财务披露工作组

我们发现，TNFD 对维持现状一再地重复描述，令人不禁担忧。基于里约的经验教训，我们发现：(1) 生物多样性保护只有在与经济增长和利润相一致的情况下才会被优先考虑，这意味着市场价值和机制以牺牲正义和公平为代价而占上风；(2) 在对话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信息披露而非监管；(3) 金融部门设计的框架代替了针对有害资金流和商业运作的政策行动，用未经证实的 "生物多样性风险" 计算取代了预防原则。我们将在下文详细阐述这些观点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

总体而言，TNFD的前提是，自然界的变化可能会带来重大风险。这意味着它们会对企业及其投资者造成财务影响，但目前市场对这些风险并不了解，因此定价偏低。TNFD的变革理论认为，一旦企业评估并披露了这些与自然相关的风险，市场就会采取相应行动，通过拒绝投资、增加资本成本或要求企业改变经营方式等方式来约束那些构成最重大风险的企业。TNFD对这一变革理论的描述如下：

"目前，金融机构和公司并不掌握所需的信息，无法了解大自然如何影响组织的近期财务表现，也无法了解组织如何对大自然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而可能产生的长期财务风险。更好的信息将使金融机构和公司能够将与自然相关的风险和机遇纳入其战略规划、风险管理和资产配置决策中"。

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好的信息 TNFD 的主要目标。但是，这些信息的预期结果：它将导致 "积极保护自然"的投资决策。这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的，包括生物多样性风险可以被了解或计算，公司和投资者将对这些计算做出回应，以及如果他们做出回应，他们回应的方式将与保护目标相一致。我们将在以下章节中讨论这些假设。

1.披露生物多样性风险并不等于解决生物多样性减少问题

首先，我们希望说明，披露生物多样性风险并不一定会为生物多样性带来更好的结果。这一方面是因为风险披露在引发市场变化方面具有战略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在此框架下构成风险的因素（即与利润相关的因素）可能并不反映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更广泛的社会目标。

TNFD 考虑的最直接的风险类型是 "有形风险"，它描述了生态系统变化（如授粉者崩溃或缺水）可能对投资产生的影响。但显然，并非所有生态系统的丧失或灭绝都会给企业带来有形风险，尤其是在与短期利润相比较时。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类型的自然都有利于资本积累，有些会使资本积累更具挑战性（害虫）和法律复杂性（受保护物种），或者干脆被认为无关紧要。布雷特（Brett Christophers）在撰写关于气候相关披露工作组的文章时，通过一个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太平洋岛屿的例子来描述这种区别：如果该岛屿与全球金融体系相对脱节，那么这就是 TCFD 正在考虑的"气候风险"吗？很可能不是。

归根结底，这是因为生物多样性风险方法的主要目标不是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而是确保金融部门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影响，并因此受到保护。这些影响可能还包括旨在阻止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强有力的法规。这类风险在这些框架中被称为 "过渡风险"，它捕捉了与生态系统损失应对措施（包括政策行动）相关的重大风险。TNFD 假设，一旦市场参与者披露了由森林砍伐监管威胁等引起的风险，市场将约束最容易受到这些风险影响的部门或公司（本例中为农业综合企业和林业）。

但是，假定金融机构和企业会有意义地走在政策行动的前面，似乎是一种不太可能的、迂回曲折的解决集体问题的方式，尤其是当一些证据甚至指向相反的方面时：这些部门，包括金融部门，往往以游说反对监管和其他形式的政策行动的形

式来缓解这些风险。例如，最近发现金融部门是游说反对制定欧盟污染活动分类法的最大集团，游说反对这一投资分类系统的金融公司甚至多于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反对该分类法的游说者中至少包括 TNFD 论坛的七名成员。因此，尽管 TNFD 将金融市场描绘成一个 "完全竞争的领域，居住着匿名的价格制定者"。但在现实中，它却被 "机构权力的集中"所击穿，而这种权力的集中往往决定了什么是可能的。虽然识别转型风险本质上并不具有阻碍作用，但也不一定具有促进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风险计算不应与针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实际政策行动混为一谈。

最重要的是，既不披露生态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也不披露潜在监管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就等同于披露公司如何影响生态系统（更不用说实际改变资本分配以做出回应了）。对自然的依赖和影响都会给整个系统带来风险，这种认识被称为 "双重实质性"。虽然该术语尚有争议，还在阐述中，但双重重要性承认这些内生风险，或者换句话说，它承认金融部门本身如何产生和加强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

然而，TNFD 进程中的一些参与者正在抵制双重实质性，理由是披露其对自然的影响会进一步削弱 TNFD 的潜力。TNFD 本身也指出，"由于被视为商业敏感数据，或担心披露信息可能导致资产和场所的安全/声誉风险，例如被环保活动团体盯上"，TNFD 面临着公司愿意披露信息的严重限制。这就是说，披露对自然的影响--这可能是人们希望获得的最重要的信息，如果他们真想实现 "全球资金流从对自然不利的结果转向对自然有利的结果"--本身就是一种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TNFD 框架确实提到了影响；但它指出，必须 "灵活应用 TNFD 披露建议"。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也在进行同样的辩论，尽管双重实质性得到广泛支持，但委员会仍继续采用单一实质性方法。

但是，双重实质性是底线，而不是上限。即使 TNFD 确实强制要求披露影响，将这些影响量化为财务风险仍然是难以实现的（也许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考虑到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而这一切距离解决这些影响或为其提供资金的问题仍有距离。我们在此担心的是，即使强制要求披露风险，也不能代替对实际资金流动或环境影响的监管。TCFD 的跟踪记录稍长（任务也更直接），可以在此进行有益的比较；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Kedward 等人发现 "基于风险的方法并没有成功地将资金流从与转型不相容的活动中实质性地转移到急需的绿色解决方案的快速建设上"。在考虑 TNFD 的真正影响时，这些发现应该让我们暂停一下。

2.支持 TNFD 变革理论的数据薄弱、且未考虑人权问题

衡量生物多样性，即使是以更直接的方式，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挑战，也是保护金融界争相寻找能够反映碳核算的衡量标准的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生物多样性风险模型所依赖的信息引发了三大担忧：(1) "正确"的数据还没有出现，而且可能不会出现；(2) 当前的数据工具大多是专有的，因此无法进行透明的评估；(3) 为金融市场提供新数据的重点与保护实践向生态系统和人权方法的重要转变脱节。

2022年3月，TNFD发布了一份关于自然相关数据和分析可用性的讨论文件。该文件证实了那些精通生物多样性测量和监测挑战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的直观感受，即使在资金充足的司法管辖区也是如此："存在许多与方法论和接触特定数据源有关的问题，降低了对投资组合公司提供的数据和评估的信心.....一些风险最大的物种未被广泛研究，也未被纳入其中"。该文件指出，"在数据标准化和相关数据汇总方面没有统一的方法，无法提供跨部门和跨地域的决策有用信息"。人们普遍认为，缺乏数据以及将这些数据转化为财务风险的模型是生物多样性风险方法的限制因素。

这种令人沮丧的数据前景与 TNFD 的唯一承诺背道而驰：提供信息，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但是，正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所概述的那样，衡量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数据或方法的缺乏不应与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缺乏信心混为一谈。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拥有 "不完善的信息" 来计算财务风险，这种观念可能会延误我们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哪些活动会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可靠科学依据而采取的更直接的行动。等待能够可靠地将生物圈的变化与对投资者回报的影响联系起来的模型，可能意味着将行动延迟到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灭绝之后。进一步投资于金融领域的模型，就等于精英们攫取了本可以投资于科学的资源，而科学的目标更明确，就是监测和管理生物多样性。

与此同时，用于衡量投资组合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或建模依赖性的现有工具往往是专有的：估计每年花费数百万美元，而且众所周知需要签订保密协议才能获得其基本方法。如果对公众以及想要验证其可信度的科学家和学者来说，这些衡量标准都是黑箱作业，那么自然积极性的说法如何能被认为是可信的呢？TNFD 在此也指出了自己的担忧：企业 "独立开发自己的数据库和相应的平台与工具，使用不可访问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方法未经同行评审，但在商业上被归类为受保护的知识产权"。总体而言，这些方法（以及更普遍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标准）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私营部门通过大量使用不透明、难以或无法评估的专有评级工具和指标，大体上控制了 "绿色" 的定义。这些条件允许资产管理者优先决定什么是生物多样性影响，这就存在一种 "绿色监管套利" 的风险，投资者可以四处寻找 ESG 评级最高的投资组合。这些披露框架对私营部门有利，因为它们可被用于 "推广薄弱的规则，并试图抢占公共监管的先机"。Kedward 等人认为，这些披露框架应被理解为一种监管俘获形式，有可能导致利益冲突和低报风险的不正当激励；例如，他们注意到一些对森林砍伐最负责任的公司广泛参与了 TNFD。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 20 年中，保护科学和实践日益认识到需要将人权和土著权利置于其工作的中心。这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态系统方法"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概念 "承认人类及其文化多样性是许多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人们普遍认为，导致生态系统变化的决策应该由那些最接受这些决策影响的人来制定。然而，正如一个组织联盟最近指出的那样，TNFD 目前并未将人权和土著权利纳入其对生物多样性的评估中，而且似乎正在使用一种背离《生物多样性公约》既定规范的自然概念。民间社会组织也对 TNFD 未能为权利人、基层团体或民间社会参与大型保护组织之外的活动开辟途径感到失望。2022年初，一个由 28 个民间社会组织组成的联盟致信

TNFD, 指出 "TNFD 的磋商程序在设计上并没有让权利人、基层组织或更广泛的民间社会团体真正参与进来"。归根结底, 尽管 TNFD 声称与更广泛的保护目标保持一致, 但这很可能是因为 TNFD 在结构上对谁来决定有害环境的活动 (企业) 以及根据什么信息 (经济损失) 持有非常狭隘的观点。我们认为, 这是对生物多样性命运进行数据收集和后续决策的一种低效、不充分的方式, 而且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决定格格不入。

3. TNFD 旨在保护现有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地

虽然它宣称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更广泛的积极影响, 但基于风险的方法首先是为了保护现有的资本集中, 使其免受与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生物多样性政策相关的冲击。我们发现, 这种方法并不适合控制金融业对环境的影响, 这不仅是由于变革理论薄弱, 还因为离开这种向基于市场的系统的过渡, 就有可能使全球危机的不平等性加倍恶化。

正如我们所论证的, 解决这些危机并不等于将资产从危机中转移出来, 因此金融风险披露不能代替政策行动。最近关于这种方法潜在结果的研究在此具有启发性。自生物多样性风险框架出现以来, 有人认为, 对主权债务这一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类别进行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时, 应开始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信用评级。然而, 第一份《自然损失与主权信用评级报告》发现, 生态系统崩溃对信用度影响最大的将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低评级主权国家。这些预测尤其令人担忧, 因为全球南部国家获得资本的条件本已不平等, 往往被迫依赖采掘出口商品的短期利润来偿还主权债务, 这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压力。鉴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绝大部分分布在全球南部国家, "自然风险" 高的国家借贷成本的增加将进一步限制这些国家政府的财政能力。由此造成的局面可能会在短期内保护那些掌握财政大权的国家, 但也可能会反向增加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压力。应对 "气候风险" 的类似方法表明, 面临最大气候影响的国家将最难获得资金, 从而无法投资于气候减缓和适应, 更不用说其他必要的社会支出了。这些结果表明, 有必要采取协调的政策方法来应对相互重叠的危机, 包括根据高度不平等体系造成的损害进行再分配。

此外, 财富集中往往是阻碍变革努力的关键因素。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表明, 在正反馈循环中, 富裕的行为体获得了对决策、关键机构和资产的控制权, 并利用这些控制权影响政治进程, 使其受益, 从而增强了影响力和控制力。这种影响力可能与其公开承诺背道而驰; 例如, 2022 年对全球最大的 30 家金融机构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尽管其中 29 家机构设定了净零目标, 但有一半机构与游说反对气候政策的行业团体有关联。

为了让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进来, 这些行业目标往往会被进一步削弱。以格拉斯哥零碳排放金融联盟 (GFANZ) 为例, 其规则制定机构 (联合国零碳排放竞赛运动) 最近开始收紧标准, 特别是提出了具有约束力的去碳化目标。此后, 两家养老金公司退出, 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等其他银行也威胁要效仿。GFANZ (由 Mark Carney 和 Michael Bloomberg 共同担任主席, 他们也是 TCFD 的创建者) 随后放弃了作为联盟要求的联合国集团成员资格。这种模式 (接受环境监管必须得到金融和企业的同意) 本身就表明了自里约会议以来, 私人金融在

塑造可能的环境方面所获得的实际权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担心 TNFD 有可能复制这种模式，进一步巩固企业和金融部门对公共目标的影响，而这本身就不利于变革。

结论

转型变革意味着我们要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包括金融部门的经济转型。TNFD 是否让我们走上了这条道路？也许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在这一框架下，我们担心信息披露会取代治理，金融业的 "生物多样性风险" 问题会取代我们所有人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专有模型会取代经过同行评审的透明数据，现有的财富和权力集中会得到主要保护，而不是那些最容易受到冲击的人，也不会考虑到人权问题。我们并不太担心 TNFD 的存在，因为私人金融机构不会停止计算其投资组合的风险，而是担心它被众人奉为从环境破坏中牟取暴利的合法对策。

尽管如此，将生物多样性风险方法纳入国际协议和国家披露指南的主流似乎是有可能的，这意味着金融部门将成为绿色金融法规的主要设计者。但金融部门的任务与政府并不相同，他们的职责比保护金融免受风险更为广泛。爱德华兹等人告诫说，鉴于 "市场倾向于纯粹从财务角度进行区别对待，这有可能导致决策和行动缺乏公益性和/或对那些最容易受到气候风险影响的人的考虑"，因此，不要将金融风险管理方法作为治理集体问题的替身。

虽然受监管的信息披露似乎比自愿性的要好，但我们应该严格考虑公共部门采取为金融而生的绿色管理战略的局限性。在谈到 TCFD 时，Ameli 等人写道："假设在透明和适当的气候政策环境下，充足的资金会流动起来，这就意味着金融部门本身无需采取披露以外的其他监管行动"。这使得金融机构和国家都能对生物多样性做出承诺，而监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在它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而是被推迟到未经证实的市场纪律理论上。

有些人可能会说，控制资金的努力不力总比不达成协议要好。然而，令人担忧的不仅是爱德华兹等人提出的 "次优结果"，还有这些努力如何 "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和稀缺资源，使其偏离其他可能更有效、更直接的机制"。当我们考虑到所有被自由市场方法挤到一边的东西时，我们发现巴西里约峰会的结果在这里很有启发性：减少有害补贴、污染者付费和预防原则，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三十年后，我们仍在为这些理念而奋斗，而市场主导的环保主义却占据了所有的领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与那些拥有最多财富和权力的人结盟。如果我们要铺开红地毯，那就铺给那些能够改变这些状况而不是迁就它们的行动吧。